



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兴民兴邦的强大力量

——《摆脱贫困》一书用典学习笔记（三）

《摆脱贫困》 用典导读

□ 缪慈潮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语见〔春秋〕管仲《管子·牧民·四顺》。意思是说，政权的成敗在于人心的顺逆，政权兴盛的原因在于顺应民心；政权废弛的原因在于违逆民心。这说明，“民心”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这句话，道出了民心与执政党相辅相成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同志当时介绍

两个事例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引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出的“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于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答案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深得民心，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二是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先生等5人访问延安，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先生对毛泽东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中共诸君”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习近平同志引述后，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的高度，要求干部一定要苦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个基本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这是对〔明〕张居正《请黜积逋以安民生疏》中“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一语的化用。习近平同志两次引用此典，意思是说，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去民之患、解民之忧。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就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语见〔北宋〕苏辙《上皇帝书》。“腹心”即肚腹和心脏，都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比喻要害或关键部分。意思是说，清除百姓的祸患，犹如去除自己腹心上的疾病一样重要。怎样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如何将“民生至上”的价值追求化为实际行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习近平同志引用此典，就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切实解决民生实际问题，把民生疾苦提升到“腹心之疾”那样的高度予以解除之。

（作者系福建省福州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摘帽之后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 张文贵

贫困县脱贫摘帽之后，怎么办？我们认为，要把脱贫摘帽作为新的起点，重整归零再出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创新举措、落细落实，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政治上坚定不移。脱贫摘帽后，不能居功自傲、沾沾自喜，而是要继续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按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坚持一手抓未脱贫户的脱贫解困，一手抓已脱贫户的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全力做好脱贫摘帽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围绕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保障扶贫、就业扶贫、基础设施和农村环境、干部帮扶、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等重点工作开展巩固提升行动，对产业扶贫、驻村帮扶、工作落实等体制机制进行再明确、再强调，着重在产业、健康、安居、教

育、保障、就业等方面持续发力。

落实中坚韧不拔。脱贫摘帽后，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态度，做好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工作。一是责任力度不减。落实脱贫攻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制，坚持脱贫攻坚工作机制不变、责任不变、工作要求不变、考核奖惩不变，督促检查不放松、全覆盖，让全县各级干部个个有动力、有压力。二是政策标准不降。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继续落实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安居扶贫等政策到村到户到人，确保将贫困群众“扶上马”后再“送一程”，实现持续增收、稳定脱贫。三是帮扶持续不断。继续抓好结对帮扶和驻村帮扶，培育一批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保证驻村工作队“有事干、会干事、干成事”，强化驻村扶贫工作队管理，确保结对帮扶工作稳定性、延续性。四是监管尺度不松。加大扶贫领域的监督检查、执纪问责力度，重点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怕、慢、假、庸、散”等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严肃

查处，点名道姓通报。对扶贫项目惠民资金中的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行为，一律严查快办，坚决遏制“微腐败”问题的发生。

大局下坚守不急。立足工作实际，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守住特色，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一是建立预警监测机制稳成效。建立脱贫质量预警监测机制，对贫困户脱贫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发布预警。对脱贫后比脱贫时家庭综合情况有所下滑，存在一级返贫风险的，启动红色预警；对脱贫后比脱贫时持平，需观察是否存在返贫风险的，启动黄色预警；对脱贫后脱贫质量上升，不存在返贫风险的，进行绿色标识。在继续享受贫困户所有帮扶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红色、黄色、绿色三种标识，分别落实“帮、扶、引”三类个性化帮扶措施。二是完善产业帮扶机制促增收。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成员劳动能力情况进行精准再核查，分类建立工作台账，量身制定帮扶措施，确保扶贫到户、因户施策更加精准。对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以

“引导”为主，在扶志扶智、教育引导、技术资金扶持上下功夫，引导参与种养产业发展和务工就业，提高自我“造血”功能，实现稳定增收。对有部分劳动能力的，以“帮助”为主，除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外，坚持人岗相适的原则，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就业，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以“扶持”为主，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和叠加享受光伏发电收益等，实行“兜底救助式”扶持，确保收入长期持续稳定、不返贫。三是完善扶志机制扬正气。坚持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相结合，引导贫困户群众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围绕孝老敬亲、勤劳致富、家庭和睦、铺张浪费、诚实守信、家庭卫生等农村乡风文明开展公开评议，评议结果接受广大群众和社会的评判和监督。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感恩奋进主题教育，不断增强群众知恩感恩报恩、爱党爱国爱家的感情，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作者系江西省广昌县县委副书记）

言传身教：以文化人的主要方法

□ 张立学

“言传身教”一词，源自《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所谓言传身教指用言行影响、教导别人。言传身教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基本形式和以文化人的主要方法，教师通过语言文字和必要的教学方法、心理情感等把专业知识、价值观念和技术动作等传递给学

生，达到育人的效果。

中国自古具有重视言传身教的传统，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就有“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的古训，这里的“不言之教”，指的是通过潜移默化的行为教育人。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的“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也都强调了言传身教的重要。古代家规家训的传承，也体现了言传身教的文化育人思想。而古代书院发展过程中，许多书院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如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讲学时就与学生共同生活，言传身教指导学生。

言传身教的文化育人方法，其特点是注重感染、熏陶、涵化，通过润物无声的言语交流、行为示范，使教育对象潜移默化之中主动效仿师者，自觉接受教育，达成见贤思齐的效

果。与灌输式教育相比，言传身教的育人方法是一种隐性的教育方法，避免了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对立，教育对象更容易接受，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教育的效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形容好的思想政治工作育人效果那样，“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其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言传身教的育人方法亦是如此。

学校要高度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专门强调教师要做到言传与身教的统一。一方面，要重视大学教师的“言传”，既

可融入课堂灌输式的讲解之中，也可结合课下点对点、点对面的深度辅导，实现“大水漫灌”和“精准滴灌”的紧密结合，把有形的知识和无形的价值观透给学生。另一方面，要重视大学教师的“身教”，通过“身教”这种无教之教、无言之教，影响学生。为此，教师必须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做到学为人师、身正为范，用自己的真才实学和人格魅力为学生成长成才树立典范。身教中不必刻意为之，只要教师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自然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政研室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新时代政法工作进行了全面制度擘画，为党领导政法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政法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机关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制定《条例》的深远意义，带头认真做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切实提高新时代政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贯穿《条例》的主题。《条例》开宗明义指出，制定《条例》的目的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政法工作的最高原则，确立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总体格局和运行体系。同时，《条例》聚焦“谁来领导、领导什么、怎么领导、如何保障”等重大问题，将领导主体具体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运行机制化、保障措施制度化，为党领导新时代政法工作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学习贯彻《条例》，首要的是把握好这个主题，坚持把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政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深刻把握《条例》擘画的新时代政法事业发展蓝图。旗帜引领方向，决定成败。《条例》总则阐明了政法工作的性质、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原则等重大问题，擎起了政法工作的旗帜和方向。明确了政法机关的基本职能，即专政职能、管理职能、服务职能；明确了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了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明确了政法工作的战略目标，即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明确了政法工作10个方面的基本原则。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政法工作的前进方向，是思考、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政法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总体要求，也是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根本遵循。

深刻把握《条例》明确的实践路径。《条例》聚焦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科学化、制度化要求，科学界定了各层面关系，科学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明确了实践路径，有力确保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条例》明确了政法工作的领导主体及职责，明确了各级党委、政法委、政法各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定党委政法委是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政法单位是党领导下从事政法工作的专门力量。上下级政法委之间是指导关系，政法委指导、支持、督促政法单位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厘清这些“上下左右”的关系，对于政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同

政法工作切实提高新时代能力和水平

□ 屈晓华

时，《条例》明确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运行机制，规定了政法工作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决策和执行、监督和责任等制度，增强了党的领导操作性、实效性。

全力以赴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条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党委政法委和政法机关作为学习贯彻落实《条例》的主力军，必须主动担当、主动作为，积极抓好《条例》贯彻落实。要坚持学习先行，紧密结合当前政法系统开展的学习竞赛活动，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和专题研讨，以赛促学，推动学习培训全覆盖，引导广大干警学深悟透《条例》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细化和修订完善制度措施，对标对表《条例》内容，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研究制定有关配套制度，增强贯彻落实的主动性、创造性、实效性，确保《条例》精神在政法机关落地生根。

（作者系四川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

（上接3版）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

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我，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

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我，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

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

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